



肖芳 报道 街头艺人陆昕在街头表演水晶球。



肖芳 报道 街头艺人李雄刚在用易拉罐制作剪贴画。



肖芳 报道 来自山西的街头艺人王士平在街头与市民合影。

“我们是有证的高品质小丑”

上海街头艺人持证上岗：给予尊重还是限制自由？

□ 本报记者 肖芳

12月3日下午，上海静安公园门口。一辆城管执法车缓缓停靠过来。几名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下了车，驱赶着人群中的“违规经营者”，疾声厉色。卖手抓饼的小摊贩、裸露着残肢的乞丐者，闻声而逃。

看到门口西侧聚集了一撮人，一个城管来到近前，扒拉开层层围观人群，高声喊道：“干什么的干什么的！”待看清眼前状况，他低声嘟囔了一句：“噢，你是有证的。”

被困在人群中央的李雄刚，操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回应他：“是的哦，阿拉是有证的街头艺人。”

李雄刚被称为“易拉罐制作达人”。他可以用一把剪刀、一管胶水，将废弃的铝制易拉罐，制作成一幅幅精致的剪贴画。他的“护身符”，是一张《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》，被他塑封得严严实实，摆放在摊位最显眼位置。

这张许可证，让他可以免于被城管驱赶，心安理得地在街头摆摊设点。目前，全上海只有8名街头艺人拿到了这张许可证。李雄刚是第6个，编号为“NO.006”。

今年10月25日，上海市试行街头艺人持证上岗，首批有8名街头艺人拿到了许可证，获准走上街头进行表演。这是国内城市为数极少的街头艺人职业合法化探索。

有钱的捧钱场，没钱的捧人场

十几年来，靠着这门手艺养家糊口。李雄刚说，自己消耗的废弃易拉罐已超过13万只。

“你要是看着喜欢，拿走就行，钱给不都给无所谓。”

只用了不到10分钟，李雄刚就应一位属兔游客的请求，完成了一幅“山兔卧石，凝神沐月”的银色易拉罐剪贴画。他用枣红色相框裱起来，双手递给了这名游客。

游客掏出30元钱，蹲下身，小心地放在李雄刚脚下的盒子里：“李老师，谢谢您！”

随后，李雄刚又应数名围观者要求，为他们制作了同样的属相工艺品。有人给100元，有人给10元，还有人说声感谢后直接拿东西走人。对于给钱的，李雄刚道声“谢谢支持”，对于没给钱的，他同样热情招呼：“你喜欢就行！下次再来！”

不定价、不销售、不乞讨、不扰民，是街头艺人们在领取许可证时，签下的职业承诺。

李雄刚说，这就叫：“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，空闲的捧个留场，喜欢的捧个情场。最重要的是，给大家一个乐场，也给自己一个展示手艺和寻求认同的人场。”

今年52岁的李雄刚，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拥有机械工程学士学位。上世纪90年代，他接替父亲的班，进入上海市一家废旧物资利用公司上班，每天和易拉罐打交道。

1991年，他无意间看到一个由易拉罐改装的烟花缸。这个简单的作品，他和易拉罐之间牵起了红线。他突发奇想，用易拉罐制作成小礼品，送给朋友，没想到大获好评。从此，他着了迷，稍有闲暇就琢磨超新的易拉罐制作方法，渐渐掌握了这门独特的手艺活儿。

1998年，李雄刚下岗了。迫于生计，他将自己制作的易拉罐工艺品，拿到上海老城隍庙出售，竟然颇受欢迎。后来，他干脆在城隍庙租了个摊位，由妻子负责看守。十几年来，靠着这门手艺，他得以养家糊口。如今，李雄刚说，自己消耗的废弃易拉罐已经超过13万只。

李雄刚说，对于这种易拉罐环保艺术，外国人的接受程度和热衷程度远远超出他的预期。

他举例说，自己曾收到一份从美国空运来的“大礼包”。拆开一看，里面是36个空易拉罐，罐身写满英文，是一个美国啤酒品牌。寄件人是他的铁杆“粉丝”美国人罗兰。“他几年前在城隍庙看到我的作品后，非常喜欢。”这次，罗兰在万里之外向李雄刚提了一个要求——用他最喜欢的啤酒品牌的易拉罐，为他最钟爱的一个棒球场所作一幅画。

“易拉罐不值钱，空运邮费倒是可以买好几箱啤酒了。”李雄刚打趣说，“这就是对艺术的热情。”根据罗兰提供的球拍图片，李雄刚只用几天就完工，对方看到后“特别满意”。

除了在家搞创作，他也很喜欢到街头摆摊，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收入，另一方面也想到更多的人现场展示易拉罐制作手艺。

但是，有时候他刚刚在路边摆好摊，城管执法人员就过来“劝离”。过往行人经过他的摊位时眼睛直视前方，生怕被缠上一样。这让李雄刚很受伤：“好像就是个博人同情的乞丐者，而不是靠本事赚钱的手艺人。”

今年10月，事情有了转机。上海市开展街头艺人持证上岗试点，李雄刚很快提出申请。不久，他通过面试和培训，拿到了《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》，成为首批8名持证街头艺人之一。

作为持证街头艺人，李雄刚说，虽然不能像以前一样叫卖作品，但他感到自己的手艺得到了别人的尊重和认可。“人们看到这个证



获得“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”的山西艺人王士平在街头表演小丑气球，显眼的位置上摆放着他的许可证。

□新华社发

书，愿意停下脚步，认真看我现场展示，欣赏我，支持我。”

卖艺不是乞讨

让兄弟俩很感动的一个细节变化是，现在给钱的人们，更多的是蹲下身子将钱放在篮筐里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站着扔进去。

因此，在表演时，他们总是把这张“上岗证”摆在最显眼的地方，也乐于向围观人群反复介绍：我们是经过专业认证的，全上海甚至全国也只有8张这样的证！

“我们的确是小丑，但我们是有证的高品质小丑。”“小丑气球兄弟”王士平、王路平的头衔表演总是很聚集人气。

他们穿着色彩艳丽的小丑服装，戴着桃红色的爆炸式假发，一边和围观人群插科打诨，一边调动灵巧双手，对着气球一阵扭、转、拧。没一会儿，皇冠、弓箭、步枪、小狗等造型赫然诞生，成为孩子们手中最拉风的玩具。

“双休日天气好的时候，800元、1000元也是赚到的。但连续表演一两个小时只赚到2块钱的事儿也发生过。”王氏兄弟坦承，“每一分钱都赚得特不容易。”

他们的收入，来自街头表演和参加商业演出，能维持基本的吃穿住行，但留不下太多积蓄。

十几年来，兄弟俩来到上海谋生，却一直找不到稳定生计，频繁变换工作。“一个月工资一两千块钱，还经常因为请假、完不成任务被扣钱。”兄弟俩过得既不富裕，也不自在。

六年前，当时从事采购工作的弟弟王路平，在一些活动现场看到用气球做出的造型，被深深吸引了。他从超市里买了一包长条气球，回家从网上搜教程，研究气球玩具的制作方法。他做出的第一个小天使造型，让一直没把这当回事儿的哥哥王士平也产生了兴趣。兄弟俩一起研究，手艺迅速长进，萌生了在街头表演的想法。

王路平回忆说，第一次表演选在浦东一家商业广场上，刚站下就感受到路人复杂的目光，两人也觉得“特没面子，很掉价儿”。直到两个月后，他们才调整好心态。

尝试表演一段时间后，兄弟俩决定辞职，专职从事小丑气球表演。这惊动了家里的两位老人，他们的传统观念希望儿子们工作稳定。王路平明白：“儿子上街扮小丑，说出去总觉得不好听。”

盛夏高温和隆冬严寒，都会让兄弟俩的表演缺少观众，揭不开锅。他们回忆说，有一年冬天，气温屡屡跌破冰点，兄弟俩拿着气球造型的手早已冻僵，在冷风中等了三个小时却分文未入。

现在，拿到了“上岗证”，兄弟俩少了很多顾虑。他们可以颇为自豪地告诉家里人，自己是经过官方认证的街头艺人。

站在街头，他们不再感到窘迫，而是大大方方地跟围观人群讲段子、开玩笑，还时不时跟大家回忆一下拿证时的经历：那个面试是非常严格的，100多个人在考场外面等着，叫到谁谁进去表演，也不当场告诉结果，我兄弟俩当时老紧张了，最后可只有8个人通过了面试呢……

让兄弟俩很感动的一个细节变化是，现在

给钱的人们，更多的是蹲下身子将钱放在篮筐里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站着扔进去。这样一个简单的下蹲的动作，在街头艺人的眼中则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——这不是施舍，而是一种尊重、欣赏。

至少得有艺可卖

陆昕一认为，为街头艺人颁发证书如果没有艺术门槛，那对真正的街头艺人而言反而是一场噩梦。

陆昕一，这个默默无闻生活了33年的上海人，最近两个月突然变成了上海圈名人。他也是首批持证的街头艺人，专业技能是水晶球和杂技表演。

在空灵的背景音乐中，几只晶莹剔透的水晶球，时而毫无依附地“悬浮”在他手上，时而行云流水般在他手背、肩膀、颈部游走。一套表演5分钟左右结束，陆昕一将水晶球放在胸前，鞠躬、致谢。围观人群鼓掌赞叹，掏钱放进陆昕一面前的黑色魔术帽中。

除了帅气的外表、柔若无骨的手法、魔幻的水晶球表演，陆昕一常常为人说道的，是他的“海归”背景。

陆昕一高中毕业后留学瑞士，后来攻读会计专业。在瑞士留学期间，街头艺人的表演让他印象深刻，“不仅数量多，而且表演氛围好”。2004年学成回国后，他没有按照家人预想成为“金融白领”，而是对魔术着了迷，萌生了做街头艺人的想法。

但是，当他了解到国内街头艺人并没有合法空间，常常和乞丐者一样被城管驱赶后，他暂时放弃了在国内做街头表演的想法。

他前往马来西亚，成为一名街头艺人。今年2月，他回到上海，依旧只选择参加一些剧场秀和公益表演。渴望在国内得到身份认同的陆昕一，给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发了封邮件，表达了想在上海做街头艺人的想法。

没想到，10月初，他接到了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的面试通知。顺利通过，他成为国内首批8名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之一，编号“NO.001”。

陆昕一很看重这张《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》。“对我而言，仅次于身份证。”

陆昕一每周都有几个下午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进行表演。当人群中年龄较大者把他称为“讨饭的”时，他会立即指指自己的许可证，语气急促地回应：“我们是经过认证的街头艺人，可不是讨饭的！”

陆昕一认为，街头艺人和乞丐者有很大区别，拉着跑调的二胡或放音乐假唱的，是乞丐者，而街头艺人是具有较高水平的一技之长的。为街头艺人颁发证书如果没有艺术门槛，那对真正的街头艺人而言反而是一场噩梦。

在陆昕一看来，如果做得好，街头艺人就有可能被经纪公司发现，获得更多资讯以及更多工作机会。

迟来了十年的议案

早在2004年，罗怀臻就以上海市人大代表身份，首次以“街头艺人管理”为题提交了议案。2008年，罗怀臻联合其余11位代表，再次提出议案。

上海成为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的先行者，与本地学者多年呼吁有关。

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市戏剧学院教授罗怀臻，便是其中最活跃的推动者。

罗怀臻有机会到世界各地行走，经常见到散落在街头、公园等公共空间中的街头艺人。他发现，这些艺人跟国内经常看到的乞讨性“卖艺”有本质上的不同。

“放一顶帽子、一个琴盒，完全没有低三下四的感觉。观赏者给钱时，不仅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感，相反会因欣赏到美好的人和事物而产生愉悦甚至感激。”

与之相比，罗怀臻觉得，国内城市越来越干净，越来越漂亮，就是少一点活力和灵性。

罗怀臻认为，街头艺术自古以来就是精英艺术、宫廷艺术的重要源头。“无论是马三立、侯宝林，还是徐玉兰、袁雪芬，这些文艺大师早年都是从庙会、街头等与观众距离最近的舞台上崭露头角，然后才慢慢走向剧场。”

因此，早在2004年，罗怀臻就以上海市人大代表身份，首次以“街头艺人管理”为题提交了议案。2008年，罗怀臻联合其余11位代表，再次提出议案。

据《东方早报》2008年的报道，对于罗怀臻等人2008年的议案，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曾在当年公开回应：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对街头艺人现状开展调研，力争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前制定管理办法。

这让罗怀臻看到了希望，街头艺人持证上岗似乎指日可待。

然而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直到2010年10月底世博会结束，街头艺人的管理条例依旧音信全无。

2012年上海“两会”，他再次联合9位代表提交议案，建议转变对街头艺人的管理思路，给真正的街头艺术留下发展空间。

罗怀臻认为，城市街头艺人大致分两类，一是乞讨型，应让其进入公益性救助系统，二是艺术型，应鼓励、引导和规范。

这一提案，在当年12月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举办的“城市发展与文化建设”研讨会上，首次得到政府部门的公开回应。时任上海市文广局新闻发言人贝兆健在研讨会上透露，市人大2013年将对上海街头艺人管理进行立法调研。

经过一年多的筹备，事情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。今年10月25日，上海为首批8名街头艺人颁发了许可证，正式展开了街头艺人持证上岗试点工作。

不是一个部门说了算

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曾就此召开专题论证会，现场一下子来了10多家相关单位，涉及文化稽查、文化管理、城市管理、市容管理、公安、交通……

如今回想起来，罗怀臻评价自己10年前的提案“不知轻重”。

之所以有此评价，他表示，自己当初提这个议案时，“就如在创作时获得了一个灵感那般喜悦，完全不知道实现它有多复杂、多艰难”。

后来他得知，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曾就此召开专题论证会，现场一下子来了10多家相关单位，涉及文化稽查、文化管理、城市管理、市容管理、公安、交通、税收等多个职能领域。

街头艺人持证上岗之所以历时十年“难产”，首先是因为它在国内无先例可循，无法可依。

与国内其他城市一样，从立法角度来看，

目前上海市对街头艺人的管理仅有两部禁止性条例：

一是2001年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、桥梁、人行天桥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、兜售物品。

二是专门针对地铁卖艺行为的《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，禁止在轨道交通设施范围内擅自设摊、卖艺或者从事销售活动。

这两部条例，在街头艺人们看来，都是“冷冰冰、不友好的”。在以往被驱赶的经历中，他们曾多次从城管口中听到“二十五条”、“三十一条”这些关键词。

这是一个涉及多部门的联动行为，不是单独哪一个部门就能说了算的。

经过长达10年的准备，上海市最终确定，街头艺人试点规范工作，由上海市文广局牵头，全市10个部门参与协调，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负责具体实施。

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寻访了全市100多位街头艺人。然后通过面试，甄选出8位高水平艺人。

“我们努力为真正有演艺水平的艺人提供一个生存环境，让他们生存的关键在于两个，一是才艺，二是行人。”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表示。

首批试点的区域，被确定在静安区。这里是上海市的市中心，历来是上海的贵胄之地。在政府官方网站上，静安区称为了此次试点，动员了区文广局、绿化市容局、市场监督管理、城管执法局等14个部门联合参与。

艺人们的表演地点，一开始被设定在静安区嘉里中心广场。之所以选在这里，是因为这里年轻白领阶层聚集，对于街头表演这种相对前卫的艺术形式能够认可和接受。

协会与8名街头艺人分别签订了从业承诺书。与从前“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”的自由自在不同，持证街头艺人被要求准时准点出现在指定地点。周一到周五，每天只允许两个艺人同时表演，周六和周日所有艺人才可集中献艺。

既已破冰，就不会再冻结

11月26日，为期一个月的第一阶段试点结束。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为艺人们换发了新证，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试点。许可证的有效期从1个月延长到3个月。

尽管艺人们对持证上岗表示欢迎，但社会上却有不同声音。

反对者认为，持证上岗要求街头艺人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表演，这破坏了街头艺人自由自在的原生态表演。

但记者采访多位街头艺人，他们的主流观点则认为，比起被限制的部分自由，艺人们更看重从中得到的认同感和安全感。

陆昕一认为，不能要求一步到位，街头艺人现在最需要的是合法的生存空间和大家的普遍认同。况且，“每天只有两人去街头表演，大家轮流来，还有足够自由时间可以支配”。

11月26日，为期一个月的第一阶段试点结束。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为艺人们换发了新证，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试点。许可证的有效期从1个月延长到3个月。

艺人们反映，嘉里中心广场虽然白领聚集，但他们来来匆匆，驻足时间不长。而与之相隔不远的静安公园，不仅聚集了有钱有闲的中产人群，还因为紧邻静安寺，可吸引大量游客，“人气儿更旺”。

这一建议，很快被采纳，第二阶段试点的表演区域被换到了静安公园。

艺人们还担忧，长期在一个场地表演，观众人群相对固定，反复观看相同表演，是否会产生审美疲劳？

对此，韦芝回应称，下一个阶段，协会将继续为艺人们寻找更合适的表演区域。

随着天气转冷，街头表演工作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。

按照持证时所签承诺，街头艺人每次表演需持续至少两个小时，但陆昕一往往坚持不下来就收工了。他的表演对着装要求很高，穿得太臃肿就无法进行。“太冷了，表演不下去了，今天收工了，抱歉，感谢大家！”寒冬时节，一次又一次，他只能向围观人群深深鞠躬致歉、致谢，然后提前离场。

静安区文化局表示，或将按季节区分街头艺人表演场地，春秋室外，冬夏室内。目前，正跟辖区内一家商场沟通，希望为街头艺人增设室内表演空间。

虽然面临一些困难，但将街头艺术推行下去已成共识。上海市文广局市场处处长杨瑞炳表示，在条件成熟后，上海计划扩展持证街头艺人数量，为他们提供更多表演场地。

在试点期间，罗怀臻曾和街头艺人进行接触。他发现，市民对街头艺人没有排斥感，艺人也没有被歧视感，收入也符合预期，也没有出现噪音扰民、影响交通等问题。

“到目前为止，试验得很好。”罗怀臻认为，这是上海在代文明发展中跨出的不小一步。